



發展經濟學研究所

學術論文

題目：資本主義到盡頭了嗎？

(這是 2017 年 7 月 2 日香港著名哲學家霍韜晦教授邀請雷鼎鳴在「法住機構」成立 35 週年演講的錄音文字版)

日期：2017 年 7 月 2 日 (日)

地點：香港大學研究生堂 P4 層王賡武講堂

講題：資本主義到盡頭了嗎 — 如何重建經濟發展的信心

主講：雷鼎鳴

主持：盧瑞珊

筆錄：真怡

資本主義的重要特徵

首先我們需要定義「資本主義」。其實這個定義不簡單，而我將帶出的也不是一個嚴格的定義。我會提出一些資本主義主要的特徵；未必所有資本主義社會都會完全符合它們，但我認為它們是比較重要的特徵。

第一、資本主義裡是有市場機制的；更準確一點，是有自由市場；再準確一點，用經濟學家的術語，是一個競爭的自由市場。如果市場自由，競爭會自然產生，因為大家都會想賺多一點錢。

第二、另一特徵是私有產權。如果沒有私有產權而有市場，我們可否稱它為資本主義？我認為未必可以。大約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有一位波蘭的經濟學家 Oskar R. Lange，他是一位社會主義者；二戰後他回到波蘭，成為一位很重要的政府官員。他創造了一套理論，認為在社會主義之下可以實行市場經濟。在當時有人同意亦有人反對，但起碼他提出了一套邏輯、一套完整的理論。他說社會主義可以用自由市場，但產權體制並不是私有產權體制。假如他的說法正確，那麼「市場」仍不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充足描述；還需要加入私有產權。



除了這兩個最核心的要求外，應該還有很多相關的法制。那些制度在每個國家、或每個資本主義國家都會有些不同，但它們的總目的，總是要維持資本主義的運作。例如法制要保護私有產權，若有人掠奪其他人的財產，這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應是犯法的。又或者，我們可看看一些不那麼符合資本主義的制度：例如有些國家會徵收相當高的稅，有時甚至不止徵收收入的稅，還徵收資產的稅。徵收資產稅比徵收收入稅嚴重很多。例如某人一年收入一百萬，而他有資產二千萬。若你徵收1%的資產稅，似乎很低，但其實已經二十萬。所以，我們會說資本稅並不符合較為經典的資本主義的要求。不過，世上有些地方正在徵收資產稅，也有地方在考慮是否徵收資產稅。如果徵收資產稅，應該是受到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認為財富要比較均分。雖然抽幾個百分點的稅不至於將財富拉勻，但它的確是向那方向走的。

經濟學重視實證

作為一個在經濟學界很多年的人，我自己比較不喜歡講「主義」的問題。可能受胡適、或受到實用主義的影響，而實用主義來自西方；經濟學界亦受到同一哲學傳統影響。胡適說：「多談問題，少談主義」，對我來說，多談問題即是將每一個問題科學化。甚麼是科學化？若我們要講出一套理論，該理論應該可以引申出一些推斷。當你講理論，要講清楚你的假設是甚麼，然後經過邏輯的推敲，然後得到一些推斷。這些推斷是理論，若要讓多些人接受它，則必須經過實證的檢驗。若我們作出某推斷，而在實際上我們看到情況是相違背，那麼我們要作分析，究竟是出了大問題還是小問題。有時只是在將假設、無關重要的東西輕微調節一下，推斷便可以符合真實世界。有時候，一開始假設便錯了，推斷一經實證考驗，便被完全推翻；那理論便需要大幅度地修改。從此角度，經濟學作為社會科學的其中一個分支，它跟人文學科是有不同，但也有其相同。人文學科很重視美感，而不少經濟學家也十分重視「美」，尤其指理論的美，或者用 *elegance* 來形容更準確。

甚麼是理論的 *elegance*？我們希望我們的假設愈簡單愈好；有時我們刻意地將之簡單化。若你用很簡單的假設，而能夠推斷出很多符合真實世界的結論，我們不但認為它美，它是正確的可能性也會高一些。為甚麼邏輯的推理會和美跟真實性有關係？這是難以證明的。但在我們的理論實踐當中，很多時發現有些人會弄出複雜的理論；其實用處不大。有時候太複雜的東西反而沒有用。我們更喜歡的是：簡單的理論、簡單的假設，所得的預測能力很強，而且通常來說，它們更經得起實證上數據的考驗。



若提到「主義」，它是比較複雜的，比較難用實際的觀察來檢驗。雖非完全不可能，但工程比較大，而且它所包涵的非常多。

或用另一個描述方法。王國維的《人間詞話》談到如何欣賞中國的詞，第一是意境。在我們來說，一套理論能解釋幾多複雜的東西；能解釋愈多，意境愈高。好的詩詞，用的字眼非常簡約，所以我們也希望好的經濟學家的理論，其假設是簡單的，描述理論也是比較簡約。

資本主義仍很有生命力

言歸正傳。我認為至今天，資本主義仍然是一個很有生命力的主義或制度。大家可能都知道，Adam Smith（亞當·史密）在一七七六年寫出了《國富論》，這書的確是現代經濟學的始祖。其實書中的很多觀念，不見得是以前的人沒有提出過。即使你讀《史記》，內裡描述的一些如何管理經濟，很多觀念跟亞當·史密是差不多的。亞當·史密是將那些理論系統化了，當然他也有新的意見，有些是很有洞察力的。

資本主義極度強調分工

他開宗明義，在第一章第一節便說「分工」。分工是資本主義社會裡很重要的一點。若在農村消費與生產，其實可以沒有甚麼分工：每個農民家庭去耕田，然後食用其收穫；穿著的是用自己織的布造的。當中也有少少分工，可能男的去耕田，女的在家織布。總的來，他們沒有複雜的分工，因此亦難以大幅提高生產力。當然農村有時也會去趁墟、會去市集，若說百分之百的沒有分工，是不大可能的。農村的特徵就是沒有甚麼分工，大家做大家自己需要的東西，做一個小而全的世界。

資本主義極度強調分工，而分工是必然需要市場的。若我造一口大頭針，這是亞當·史密提出的例子，製作的過程是很複雜的。你怎樣得到鋼水？如何將它磨得很尖銳？又或者一支鉛筆，其製作過程可能經過幾千人的分工。在資本主義社會，它慢慢形成不同的市場；市場很多。例如你製作一支鉛筆。筆頭有一塊擦膠，它不是膠，是一種化學物質，似乎大部分是來自印尼。筆管的軟木、內裡的碳心，還有圍著擦膠的金屬。金屬如何得到？要開鐵礦、煤礦，還有煉鋼……那一小丁點的東西已經牽涉非常複雜的過程。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你不會感覺到它的複雜性，你想要一支鉛筆便到文具店買，是很容易得到的。若你細想，便會發現一支鉛筆背後有非常複雜的分工和市場，是經過市場交換的過程才製作出這些東西。



若我們說資本主義有效率，是它有一雙無形的手將世界上很多的生產者和消費者拉攏在一起，但你又不會感到這過程很複雜；它毋須一個中央計劃來指揮，在市場中每一個參與者只需要關注一點：就是市場的價格。

每一位參與者只需要關注價格

我作為一個消費者，我想買一支筆，要買鉛筆、原子筆還是甚麼筆，我只中要考慮價格：若我認為那支筆很有用，我便願意付出多一點的錢；如果價格高於我願意付出的，我便會購買另一樣。

生產者也是關注價格。如果他的筆能賣得比較高價，他便願意買進多一些木、鉛心、擦膠，生產多一些鉛筆。如果價格低他便不會了。所以在資訊上，他很簡單只需要看價格，不用關注其他。當然，在背後的動機或誘因，未必是那麼無私或高尚，可能只是為了賺錢，只要看價格。

因此，資本主義的其中一個優點，就是它在資訊上的要求十分低。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有一系列的數理經濟學家（他們後來也取得諾貝爾獎），採用十分嚴格的數學證明好些定理，而這些定理以往是證明不了的。為甚麼證明不了？因為那些定理，需要用到拓撲學中定點定理（fixed-point theorem）的工具。在一九二幾年，最初階的定點定理已經被數學家證明了；至五十年人初，開始有經濟學家懂得用這種定理去證明一個競爭的市場可以達到均衡點，而該均衡點是存在的。

如果我們說市場競爭之下，可以達到一個結果，而該結果不存在，那麼便沒有意思。說話容易，要證明那一點存在是很複雜的數學問題。它不止是要證明某一市場的供求關係是否平衡，而是證明所有市場的供求關係都可以同時達到平衡。有時候，當一個市場平衡了，其價格會影響另一個市場；每一個細微調整，都會影響其他市場。這些都是充滿變動。到最後所有市場同時平衡，是否可能呢？它是否有一自我調整機制，會自動趨向該均衡點？要證明這均衡點是穩定的，在數學上並不簡單。

那些經濟學家，證明了在合理的情況下，通過競爭的市場（競爭是指大家都追求自己的利潤，希望減少成本；而消費者希望得到最多的利益，而這並不一定需要購買），通常只會得出一個均衡點。這個均衡點的「唯一性」並不是必然，但其存在性和穩定性是一個更為重要的結果。



自由市場是互利的

我們現在知道這市場機制了。這個機制需要大家追求自己的利潤，或追求自己的快樂。在此我要特別強調自由市場；自由的意思是不是有人迫你去買賣東西，一定是自己的選擇。如果你的行為是被迫的，以上所講的都會不對。若果是完全自由的市場，買賣應該是互利的。例如我以十元將一東西賣給你，而你願意買；我願意以十元賣出，必然是因我認為有賺，有利益，而你願意付出十元，這十元必然是低於這東西為你帶來的利益。若這個互利性不存在，是沒有理由有買賣的，除非買家或賣家非理性，或者是被強迫的。如果我們排除了這些假設（非理性、被迫），那麼自由市場是互利的，大家都有好處。

市場不只是產品市場一種；有很重要的部分是生產要素市場。甚麼是產品？例如我手上的一瓶飲品，我可以直接消費，這是產品。生產這個產品，我們需要投入一些生產要素，例如勞動力、資本、機器、土地等等，我們稱為生產要素。我這裡列出了勞動力、資本、人力資本、土地。人力資本英文為 human capital，這個概念在五十年代開出，到六十年代很流行，它是指知識，或影響生產力的知識。如何可以得到人力資本？最主要的途徑是教育。例如你多讀一點書，你工作而積累了工作經驗，這些都是有助提高你的生產力，都是人力資本。為甚麼我們稱它為資本？資本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是需要你投資的。例如你要儲錢以購買土地、機器，它們可以幫助你生產，幫助你每年都有一些新的回報，我們稱這些為資本。同樣地，你的知識也可以成為資本，因為知識是需要付出代價，例如你讀書要交學費，更重要的是你要付出時間、心機。

人力資本是投資的一部分。它可以如何幫助你？即使用知識的狹義來說，知識讓你將來在職場上、工作上收入提高，是有回報的。以香港人口普查的數據作分析，即使近年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點沒有甚麼提升過，有點停滯；但若其他因素相同，可以推斷大學畢業和高中畢業的人一生的平均薪金，相差 98%，幾乎一倍。意思是，讀完大學你收入未必很好，但若你沒有機會讀書，則問題更大。是否每個人大學畢業都會有那多 98% 的收入？也不是，還要視乎你讀那一科、做那一行業、你人生的際遇等。我剛才所說只是平均數。它也受到性別的影響，當大家的條件完全相同，例如教育水準，女性的收入分別是較低的。在香港，即使將所有外傭的數字撇除，女性收入還是較低的。要知道很多菲傭是大學畢業的，我以前聘請的菲傭，原來在菲律賓是讀經濟的，但在家裡從沒有跟我討論過經濟。不過他懂得國際貿易，每次回菲律賓他都會揸兩大袋東西回去賣。人力資本是有回報的，而剛才我們是用狹義的定義。知識帶來的回報，其實不只是提高收入，還有其他，例如快樂、審美角度等，在此不多討論了。



市場的公平性

資本主義時時被人詬病的，是其市場的公平性受到質疑，尤其是簡單的勞動力，沒有受過很多教育的人，收入是偏低的。在香港，完全沒有受過教育或工作經驗的人很少。如果根據大約十年前的人口普查的數據推斷（2016年的普查數字未出），一個文盲，完全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女性的收入約\$3900；男性則高一點。若說純勞動力，男性大力一些，所以他的薪金高一點。那麼為何香港的薪金一般會高於這點？因為幾乎所有人都從其工作經驗或多或少積累了人力資本，又或者他受過教育，不是文盲。但總的來說，在資本主義社會裡，你會看到有些人的收入頗低，有些人則可以很高。例如 Facebook 的創辦人 Mark Zuckerberg，他公司的價值已達五千億美金。他願意捐出九成的財富，這是值得我們稱讚的；現時還未有中國人做得到。Bill Gates 也是願意捐出幾乎全副身家，只留少許給下一代。我認為這是資本主義最完美的做法，這點待會我會補充。他們拚命賺錢、很有效率地賺錢，然後捐出賺到的金錢，這真是值得中國人學習。

在勞動市場、要素市場裡，究竟收入是如何分布的？其實這一難，在大學一、二年級，甚至中學裡的教科書都有這數學證明：一個人的薪金有多少，是會趨向 MPL，即是 marginal product of labor，中文是勞動力的邊際生產力。例如在一間公司，已有 100 個員工在生產；是否請第 101 個？若我請這個人，他可以生產價值十元的東西，那麼第 101 個員工的邊際生產力是十元。勞動生產力是有報酬遞減率，請人愈多，邊際生產力會愈低。太多人在公司做事，人浮於事，是沒有甚麼用的，所以勞動生產力會愈來愈低，所以公司不會請無限多的人。如果新請的人只能生產五元的東西，公司不會付出十元來聘請，因為虧本。公司又會否少請一些人？若它只請 90 人，通常第 90 人的勞動生產力會比第 100 人高；若第 90 人能生產十五元的東西，而薪金只是十元，那麼不聘請他是公司的損失。因此，公司會繼續聘請，直至邊際生產力與薪金相同；至那時公司不會增加或減少員工。當然，這裡有好些假設，你是否真能夠準確地知道那位員工的生產力？如何量度？可以逐個員工量度？在現實世界是很難這樣準確的。但它這個總結性理論，有很多實證的證據證明它是對的。

提供資本的人會取得幾多回報？他取得的回報其實等如他的利率。利率有很多種，如果你現在存錢在銀行，息口很低，因為銀行為你吸收了所有風險。若你自己投資，而有能力找到回報很高的，可能比息口高得多。通常回報高的風險也高，所以一般我們計算回報是要經過風險調整的。這個利率有幾多，同樣可以證明這資本的邊際生產力，跟勞動生產力的概念是十分對稱的。大家只要都在自由競爭的市場，市場便會自然走到這個平衡點。



下一個問題是：如果每個勞動力的薪金都等如他的 MPL，而每個資本家的投資回報都等如他的利率（MPK），那麼勞工的薪金乘勞工的總數，再加資本家所提供的資金乘回報率（MPK），兩者加起來，剛剛會用盡了總生產力，即是分配得剛剛好。

在更複雜的世界裡，其實不只有兩種生產要素，例如你可以加入人力資本；不過其實概念一樣，只是方程式變得複雜而已。我想帶出的信息是：你只要容許市場自由競爭，每人取得的薪金，或資本家取得的回報，大家的標準一樣，總生產自然會剛剛好分配給所有人。在數學上這稱為歐拉定理（Euler's Theorem），是上世紀三十年代一批英國劍橋大學的經濟學家的證明，當然，正如所有定理般，它的成立也需要特定的條件。在今天來說，這些不是新的理論，已有八十多年了，但仍然在教科書裡，是大家會學習的。

巴列圖最優

自由競爭和減少干預在資本主義市場裡是非常重要的。剛才我说的话背後，都有一個假設，就是那個市場是自由的，不是被迫的、不是由政府強行用政策做的；若有干預，剛才我所說的便不準確了。每次講資本主義，我都要經常強調：若政府插手干預，要小心一點。我不會說所有干預都錯，但很多干預都會令價格扭曲了，未能到達最優點（巴列圖最優 Pareto Optimal）。

巴列圖是一個人名。Pareto Optimal 表示結果的效率是最高的，它的意思是，當時市場的分配已經是最好，沒有更好的，若你更改分配，即使你令到某些人得益更大，也一定會令到其他人要放棄某些東西，要蝕底；也即是沒有剩餘。如果分配是沒有效率的話，即是還有潛力未用，那麼是有可能大家都得到多一些，或起碼有些人得到更多，而其他的人沒有蝕底。巴列圖最優就是表示已經沒有進一步的潛力可用，已經是最好，用盡了。自由市場的一個特徵，就是其最後結果是巴列圖最優。所以我們認為自由市場之所以能夠產生財富，巴列圖最優是重要的一點，市場沒有甚麼浪費。當然，在實際世界有沒有那麼完美，一切自由市場需要的條件都存在？不是的，世界沒有那麼完美。但當它比較接近市場的均衡點，它也是接近巴列圖最優點的。

在歷史上，大家知道工業革命是十八、十九世紀在歐洲開始。在十九世紀初，英國每年的 GDP 增長率低於 1%，而這已經是一個革命。在近代我們看到的高增長，在人類歷史上是從沒有發生過的。有經濟歷史學家估計過，由漢朝至 1950 年中國的人均 GDP，扣除物價的因素，這二千年來增加了大約 19%；意思是 1950 年的人跟漢朝人的生活水準差不多。當然在這二千年裡有上落，然而中國的生產力一旦高了，尤其在農村，人民便生育多些子女，所以人均收入難以提



升。試想想，二千年才增加 19%，年均增長便是 $^{2000}\sqrt{1.19}$ ，那增長率是少於 0.0001%。因此，在工業革命時期低於 1% 的增長已經被認為很了不起。現在是甚麼樣呢？中國的增長最厲害。從 1978 年至 2016 年，扣除通脹和人口，人均實質 GDP 是上升了二十一倍！如果不計人口，GDP 是上升了三十三倍。這絕對是非常現代的一種現象。中國的增長率，是人類歷史上（不只是中國歷史上）所未曾有過。這是有很多數據為證的。

為甚麼這些增長會出現？在工業革命，很大程度是因為市場因素。當時有很細緻的分工，有分工必須有市場，而且這個市場不只限於英國。英國打開世界市場，你可以說它開拓殖民地，這無可否認；但若它沒有這樣的市場，是支持不了那樣的分工。市場愈大，才能容許愈大的分工。

自由與干預

當自由市場受到干預，價格會扭曲，這會滋生不當的權力，便會有尋租活動出現。舉個例子：在七八十年代，中國還未改革開放；當時香港人也不太富有，有些人會喜歡到廣州消費，因為廣州便宜很多。若你住一個床位，大約一塊錢住一晚，五毛的也有，提供一張帆布床。若住房，大約三元一晚。去動物園，入場費大約兩毛；一碟餸菜也不用一塊錢。當時廣州的市容不太好，東西很舊；若你走經珠江，會見到江邊有很多椅；很多人在那裡拍拖，一張椅坐兩對人。其實不太方便，但無位置，所以都擠在一起；那裡也沒有甚麼燈光，黑麻麻。為甚麼大家要在那麼公眾的地方做私人的事？很簡單，他們沒有住處。當年嚴重缺乏房屋，房屋的價格壓得很低，只是數塊錢一個月，租錢連維修費也填補不了，更加支持不了建造新房子。所以，那些人能否結婚，很視乎他們能否分配得到一個單位；也不是一整個單位，可能只是小小的一個閣樓、房間。因此，有些人十多年也未能結婚，不是有人阻止，只是他們沒有地方住。

因此，有很多人希望得到住所。如何能得到？很多時要走後門。誰會受賄收錢？當然是那些有權力決定是否分派單位給你的人。那時賄賂變成相當盛行。本來在文革之前，中國的貪污指數很低，是世界最廉潔的地方之一；但至文革，則連法制也消失，至七、八十年代貪污便很猖獗。在之前的三反五反或許殘酷，但的確壓低了貪污，只是經過文革後，全部又回復了。為甚麼那些人有權力去收受賄賂？正是因為價格被干預，遠遠低於人們願意付出的錢。

另外一個例子。在 1987 年，我在美國教書。當時美國商務部跟中國教育部合辦中國第一個 MBA 計劃，派我到大連教宏觀經濟。我去之前以為我需要教很多馬克斯經濟學，但去到後發現學生對那些毫無興趣，大家都只是對如何可以快點賺錢的學問有興趣。我當時住在專家樓，要買一部單車，我便到大連的友誼商



店購買。友誼商店只收取外匯券，那些外匯券是要由外國人從外地帶外匯到中國才能兌換的。我記得我買了一部鳳凰牌，是最好的一種，五百多元外匯券。我用了一個暑假，教完書要離開了；那些服務員都爭著想我把單車轉讓給他。我心地好，最終以原價讓出，即人民幣的價格；若要求增加二、三百元，他們是願意的。為甚麼？因為要得到鳳凰牌的單車是很難的，所以他們願意付出更高的價錢，會走後門。我不敢收賄，便照原價售出了。這是價格受扭曲後有權力出現的現象。如果今天你在大陸賣單車，會不會有人賄賂你？如果單車定價二百元，而你要求另加一百元給你，你除了會被人拉去，單車也賣不去，因為他們到隔壁的店舖便可以買到了；當市場在競爭，你是沒有能力去接受這些利益。因此，扭曲的市場價格是帶來很多貪污或尋租活動的原兇。

究竟民主還是獨裁會損害市場的自由？其實兩者都有可能。我不認為民主社會的市場一定更自由，也不認為獨裁社會的市場一定更自由。若你遇著一個很善良的獨裁者，他很有見地，不干預市場；雖然你不容易找到這樣的人。民主社會也一樣。假設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在立法會立法有沒有干預？有極多的干預。他們的考慮不是資源分配是否合理，效率的高低，他們沒有這些想法；再加上民粹主義出現（民主與民粹有差別，但很多搞民粹的人都會自稱民主）。民主制度未必一定對自由市場有幫助，也未必一定對資本主義的發展更有利；此中沒有必然關係。

全球化帶來的衝擊

為甚麼會有這樣的問題？有危機出現，才會出現這樣的問題。是甚麼危機？有不同的來源，但最明顯的是全球化。

在過去二、三十年，全球化帶來很大的衝擊。很多的市場連在一起；在市場的邏輯，當你市場愈大，分工可以愈細緻。用手機作例子，我手上這部是 iPhone 7。曾經有人研究過，數字是七八年前的，現在會有些變化，但帶來的信息是一樣的：若電話價值六百美元，雖然手機在深圳造，但有幾多價值是在中國生產的？來自中國的？在七八年前，大約是十元。日本負責製造顯示屏，大約是一百元。美國當然最多，連 marketing 等等都由它包辦。零件來自世界各地不同國家，中國的富士康只是負責將之合成，所以富士康這加台灣公司加上聘請員工等等，都只是十元。這對中國來說是很蝕底的，所以近年中國要求要提高生產增值，現在不只十元，大約提升至整部電話的 20% 以上。

中國現在也有很多科技公司，例如華為。華為電話的賣點是其相機鏡頭，而鏡頭來自德國。現在的分工，在世界很多不同地方，每間公司只專門製作一個小零件，而有可能這公司幾乎壟斷了世界上這零件的製造。它也有競爭壓力，若



它的價格太不合理，其他公司可以做到。分工非常細緻，不同國家、不同公司在生產不同的東西，然後交換，才能製作出複雜的產品。這需要市場愈來愈大，所以規模效應是很重要的。

大家或許記得，去年有部周星馳電影《美人魚》，票房賣了二十八億人民幣。這是很驚人的。香港的電影若賣了三千萬已經算很賣座，二十八億實在難以想象。這電影的規模很大，讓很多人願意投資，而且它能利用很多不同地方、不同團隊所生產的東西，所以香港很多明星都有參與。我家有部機頂盒，隨時可以看幾萬套電影、幾萬套電視劇，你會看到在很多大陸劇裡，都有香港人。我記得十多二十年前無線拍花木蘭，說花木蘭去打仗，感覺就好像去逛街，早上離開朝廷，一會兒便打完回來了：毫無場面可言。現在的戲，戰爭場面很逼真。要有大規模、大市場才可以支持這樣的分工和合作。

全球經濟一體化將多個國家捲入了資本主義市場的世界。它們必須交易貿易，有很多效易，資金的流動也很厲害，錢是到處流動的。香港有個優勢，就是香港沒有限制資金的流出流入，每天都有很多錢的出入。由於市場急劇增大，分工很細緻，生產力也更加上升。

近年中國出現微信，我現在還未太懂得用。我買新電話，正是因為舊電話的記憶體不足，在內地沒有微信很不方便。現在內地的乞丐都用二維碼，你用電話照一照就付錢給他。我少給錢乞丐，因為怕被搶。但沒有微信真的很不方便。早前我在北京清華五道口附近，有一間小店棗糕王，賣棗糕的，十元一斤，買一斤還送半斤，十元便足夠吃兩三天了；很便宜，所以大排長龍。你阻礙他做生意的話，他們會很不高興。大家排長龍，人人都拿出手機照一照便付款了，唯獨我拿出人民幣，賣糕的人很不高興，因為他要除下手套數錢。為甚麼微信可以搞這麼多的新科技？因為中國差不多有十億人用它，已經成為生活習慣的一部分；只要想出一個 app 便可能可賺錢，所以它擴展很快。若沒有市場的規模，做不了這些，例如香港只有七百萬人的市場，提供不了足夠的回報。微信現在便面向全世界。所以全球經濟一體化對於生產力的提高，重要性相當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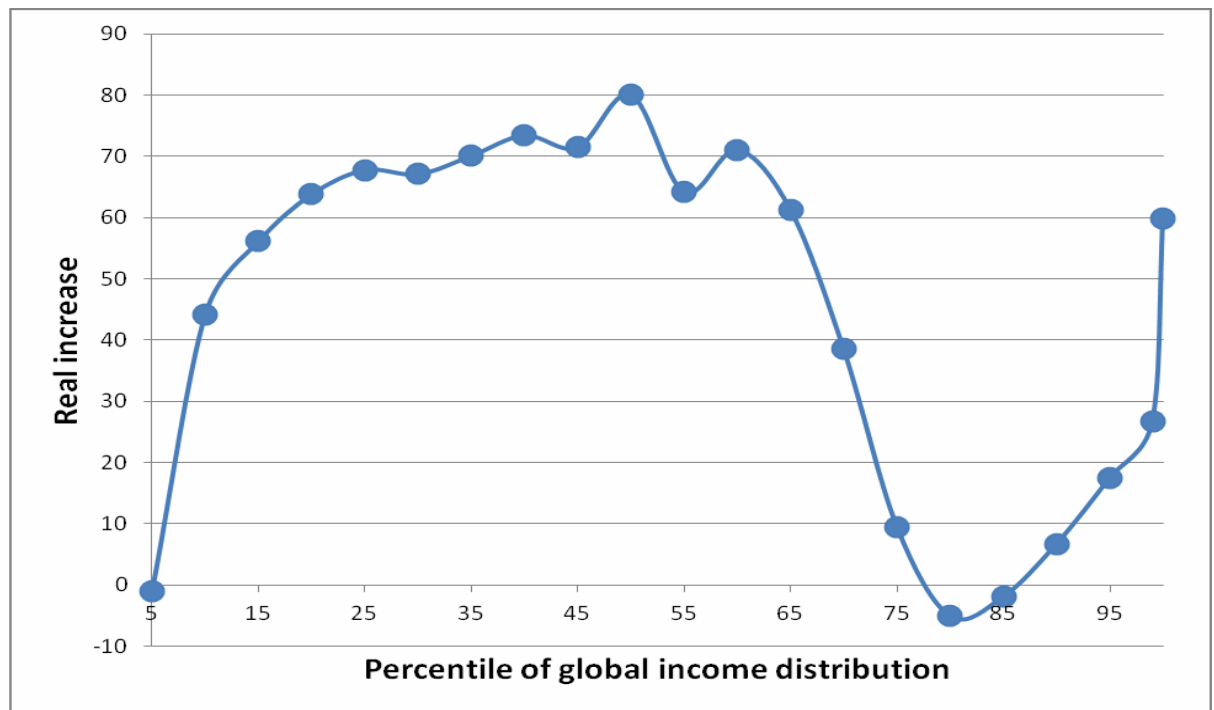


大象曲線

然而，這是否表示全世界的財富都是大幅增加？貧窮會減少？若我們看數據，看到大致上如此，但不是全面如此，也出現了一些問題。

這裡想介紹一個概念，名 Elephant Curve，是一幅圖；中文我姑且命名為大象曲線。

這條線如何得來？有一位在世界銀行工作的朋友 Branco Milanovic，他接觸到很多數據；他集合了世界大約 94% 人口國家的入口普查數據，然後將這些人口的國界消除，就好像地球村，把所有人的收入放在一起，看看他們的收入分布及如何變化。這不是國與國之間，而是合部人口之間的數字，由 1988 年至 2008 年二十年的變化。這變化未有足夠反映中國由 1978 年到近年的改變，但這些數字的信息已經很有參考價值。



圖表的橫線，代表收入的百分位數。橫軸最左邊是最窮的 5% 世界人口，在 1988 至 2008 年的收入，幾乎是沒有上升過。這其實已經不是最差，因為由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某些非洲人的收入是下跌了四、五十個百分點（已經扣除通脹）。

我們習慣了處於高增長社會，你不要以為增長是必然的，有些地方是愈來愈窮，而且不是短時間，而是幾十年來一直下跌。貧窮是一個很難的問題，你如何去增長經濟？這一點也不簡單。在五十年代非洲已經很窮，還下跌幾十個百分點！現在這圖表的數字是 1988 年及後二十年的比較，全部已經扣除通脹因素；1988



年最窮的 5% 的人的收入，與 2008 年最窮的 5% 的人的收入比較，幾乎是沒有任何上升。

橫軸上的 15，是指這些人還是很窮，比 15% 人有錢，比 85% 的人窮。在這二十年間，他們的收入上升了多於 50%。橫軸向右那部分的人，收入都上升了很多；但到 80 百分位左右開始，即是最富有的兩成人，有相當人的財富沒有增長過，停滯了。這些是甚麼人？包括了香港人。在 1988 年，香港人的收入絕對不在左邊；最富有的兩成人是發達經濟體裡的人。而在發達經濟體裡最有錢的人，首 1 至 2% 的人的財富，上升幅度也很大。這些又是甚麼人？主要是中國、印度、巴西等，或者巴西不算。中國和印度人口最多，而這圖仍然低估了中國和印度的上升。例如在 1988 年，中國的收入仍算是窮；但到 2008 年，中國不止是上升，簡直是跳躍至前面。印度經濟增長的起飛較慢，大約是 1992 年開始，而過去平均增長率較中國低，近年稍高過中國；不過總人均收入，印度大約是中國的四分之一，或不足四分之一。所以印度仍未算富有國家，但中國的上升很快。

不平均的增長

在全球化下，我們不能說它帶來世界人民更大的痛苦。因為大部分的人通過全球化、通過分工，收入大幅上升，最明顯是中國，一家也較熟悉中國。中國改革開放，並不是全面的市場化，但它增長的動力主要是市場化和私有產權。以往共產黨所用的政策跟今日很不同，當時一切都縛定了，沒有空間活動。鄧小平搞改革開放最大的特徵是引入了市場和私有產權，也讓企業家能夠創業。鄧小平主要通過這些途徑，其實是局部的資本主義化，雖然大陸不承認，因為這說法在內地是忌諱。

在全球化下，也有些人沒有得益。他們之所以沒有得益，很可能是與當地的制度有關。非洲有一些國家是亂糟糟的，從機場到市區，你需要坐吉普車，還有持機關槍的人保護你才可以。在這樣的制度下，經濟如何能增長？還有打仗、瘟疫。聯合國、世界銀行或其他外援捐錢給這些國家，也可能被貪污貪掉了；制度和文化的障礙，讓這些地方的經濟很難上升。不過今天的一些非洲國家，例如尼日利亞，它開始有些上升，它們正學習中國模式。中國模式在非洲和波蘭有很多粉絲，因為它們的性質跟中國幾十年前差不多，甚至更窮；它們看到中國的上升，所以很多人會走來學習，想將中國的模式搬回去。我有一位舊同事林毅夫，現在他時時要去非洲，正是因為他懂中國的發展模式，非洲不少地方在經濟上想學中國。

香港、歐美近年是出現了問題，沒有甚麼增長。從我們的角度，是看到前無去路，後有追兵。前無去路的意思是，我看到身邊的朋友，出身跟自己差不多，



但為甚麼他們風生水起，而我這麼不濟？你很容易遇到這些人。我們當然不喜歡這樣的人，他憑甚麼賺錢比自己多這麼多？他是否用甚麼神秘方法賺錢？這些風生水起的人，社會上可能視之為精英，所以在香港或歐美社會出現了反精英的情緒，所謂「精英」提出的東西，一般人都不會喜歡。另外，歐美和香港也很排外，為甚麼？自己人一點增長也沒有，為甚麼別人上升得那麼快？你會懷疑那些人是否搶走了你的飯碗或財富，這種想法十分容易出現。這種想法有沒有根據？如果你看看他的處境，又不可以說他毫無根據。

為甚麼別人增長那麼快，自己增長那麼慢？有很多種原因。其中一個原因：以往發達國家所做到的事，現在落後國家都做到了。例如製造汽車。日本、美國生產汽車，幾十年前中國是做不來的。記得1987年我在大連教書時，看過一段報章新聞：中國的貨車轉型，有大進步，很厲害云云。再看下去，原來他們成功地複製蘇聯1945年的汽車模式……蘇聯已經不妙，還要是1945年！當時是1987年。可想見當時中國的汽車製造很落後，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不是很久遠。但在當年，這已經足以慶祝，汽車廠要賣這樣的廣告。現在不同了。上星期我隨一個代表團到深圳，參觀了比亞迪BYD，他們生產電動汽車。他們的汽車好不好我不敢說，在電力方面，他們的確很先進，在世界取得很多獎項。世界變了，科技變得很進步，改變了中國的面貌。為甚麼中國做得到？比亞迪是連巴菲特也投資的，因為認為它有潛力。比亞迪是中國造的，但暢銷世界各地，不止在中國賣。香港好像沒有，大陸很多，歐洲也有；旅遊巴、垃圾車、小汽車都有。

印度曾有一段長時間搞電腦軟件，他們很厲害的。大約在九十年代後期，在香港讀電腦是死直的，在科大的也免不了。本來在九十年代中期之前，來科大讀電腦的都是很有才能的；但九十年代後畢業的卻找不到工作。現在情況有所好轉，市場又開始變。為甚麼九十年代後期會有這樣的轉變？因為印度Bangalore開始有很多人懂得寫電腦程式，而且寫得很好。美國那些軟件公司沒有因而倒閉，但它們都轉到印度聘請人，即是將工作外判。

現在，中國一樣出現很多這樣的人。中國每年所生產出來的工程師，即是讀工科的，大約每年二百五十萬人；在1997年，中國每年入大專的學生大約九十五萬人，現在每年七百多萬人畢業，其中約二百五十萬人是工科的，而工科裡很多和電腦有關。畢業人數七百多萬，比美國和歐洲的總和還多。這樣多畢業生，歐美和香港遇到的競爭是很厲害的，所以你想提升收入並不那麼容易；除非你好好利用你的優勢。



優勢很重要，例如 Facebook，它有它的創新，他做到而你做不到，那麼他可以一直很值錢。Facebook 請人，大學畢業生普通的也十萬美元一年，他們能出錢因為他們有優勢。若你沒有優勢，很容易變成失業。增長低容易引起社會上很多的情緒，上述的那幅圖可以解釋不少社會現象。

在特定的條件下，全球化可以令到生產和技術轉移到有能力的後發國家。或者我用一帶一路來表達。我相信一帶一路這概念是有前景的。原因很簡單：一帶一路裡六十六個國家，相對來說很多比較落後，而落後國家在未來二、三十年，發展會否比發達國家快？有可能的，但不是必然，它需要條件。甚麼條件？這些落後國家需要捲入全球化，變成全世界的一部分。如果它與世隔絕，無論世界如何進步、生產力有多高，都跟它沒有關係，學習不了別人的長處；所以必須與別人交易，需要別人的投資，才能快速地學到別人的技術。技術之外，還有管理方法。香港人對中國經濟的貢獻曾經很大，幾十年前香港人到珠三角創業，將香港的商業網絡關係、香港的管理技能和生產技術都提高，令到珠三角有所謂的後發優勢：它本來比你差，但因為向你學習，不用慢慢摸索，所以進步更快。

一帶一路裡的國家，無論非洲還是中東，它們可以上升但必須先有全球化的環境，令它們變成世界資本主義的一個部分。不過這不簡單，需要有硬件和軟件，硬件是為它們建設多一些碼頭、飛機場、公路、鐵路等等，否則它們難以接通世界。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包括提供金融服務，建立加工區等等，這些全部都是香港人很擅長的事。還有一步：你要明白別人的文化、習俗、制度，這便困難得多，這方面香港人也不太做得好。另外，香港人所謂國際化，其實熟悉的都是歐美，或東南亞，其他的不大熟悉；到中亞細亞那些國家，香港更不懂了，不但語言不通，連那一區危險那一區安全也不知道。

早前我在清華遇上一位朋友，一帶一路的國家他幾乎都去過了，非洲的五十四個國家，他去過五十二個；中國所有的縣，只有 1% 他沒有去過。他得到的結論是：想參加一帶一路，如果是女性，要加倍小心，要找一些安全的地方。有些地方是較安全的，例如泰國，也是一帶一路的國家；但也有很多國家是很危險的，如果你沒有能力而去，是有人身安全問題的。這是他的結論。香港人不要隨意四處去，要有了解；我們學校（科大）也曾經在一帶一路的國家活動過，例如早幾年前在沙地阿拉伯開辦一個 MBA 的課程，為某公司教 MBA 學生，我們定期有同事飛過去的。在初期，我們有女同事反對，因為女同事去到受到歧視，例如去到商場沒有女廁，因為他們認為女性不應到商場拋頭露面。若你沒有戴面紗，在街上可能會被人丟石頭。我們有些婦解主義的同事對此十分反感。後來我們派一位女性同事去考察，決定要舉辦這課程，但要由我們負責收生，而



起碼 30% 必定是女性。若你不教育那些女性，那麼他們更難出頭了；唯有提供教育才能解放他們。後來我們投票決定，勝利了，於是課程出現。若你從未跟他們斡旋過，你不知道是這麼麻煩。他們的宗教、文化、制度等等，都是你需要熟悉的。

社會走向兩種極端

現在全球已經出現很細緻的分工，也出現很多機遇；然而全球人民收入分布出現甚麼變化？表面上是矛盾，但實際上並不矛盾。

第一、在地球村裡，即全世界的人民集中在一起，貧富差距是縮窄了，基尼系數 (Gini index) 下降了，這是近年出現的。原因很簡單：中國和印度以前有很多窮人，這些國家的人的收入都上升了，即使農村的收入上升不及城市，但當人均收入是上升二十一倍，你只上升十倍實際上也很厲害了。因此，當一大群貧民的收入大幅上升，收入分布的差距沒有那麼大。另一方面，就如剛才大象曲線所顯示，有錢國家停滯不前，所以全世界的收入差距收窄了。所以，在全世界來說，「貧者愈貧，富者愈富」是一個錯的定論；這在整個世界來說是不對的，反而剛剛相反。中國從 1978 至 2004 年，便有六、七億人以上脫貧（用聯合國標準）。

第二、在每個國家或每個經濟體裡情況卻很不同：內裡的貧富差距似乎增大了。好些窮國整個國家富有了，但在這國家裡，貧富的差距卻比以前大了。記著鄧小平說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若你讓所有人的收入同時上升，或接近平等地上升，是做不到的；結果只會是沒有人收入上升。共產主義當年就是希望這樣，但不成功，因為大家沒有誘因去出多一些力。你沒有回報付出更多、更勤力的人，還說要打擊資本主義的出頭鳥，誰富有一些、勤力一些便立即被鬥爭，這樣的做法對國家經濟造成很大的困擾。既然鄧小平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所以有些人是先富起來了；他們富起來後，有人會模仿，部分成功的便也富起來。其他人便沒有那麼成功，但也不是太差，例如他打工，薪金可能上升了，社會也提供一些教育。現在中國在適齡人口中，有 33% 是可以入讀大專院校的，其中大約一半是正式的大學，人數十分多，而且可能繼續提高。不過增長太快可能也帶來困擾，太多大學畢業生，他們是否能找到工作？社會是否來得及調整？也是不簡單的。跟七十年代比，我相信現在中國的貧富差距是闊了；不過現在中國最窮的人，可能也比中國七十年代收入最高的人為高，因為人人的收入都提高了。提升了二十多倍，是一個極大的數字，你只要想像一下，將你今天的收入減去 95% 或 96%，你會處於一個甚麼樣的環境？那麼你知道以前低收入的狀況是低至甚麼程度。



關於收入分布，在發達的經濟體，以香港作為例子，有些香港人收入增加很多。我們先不說資本家。很多人認為財富都去了地產商那裡，地產商賣樓那麼貴，讓人氣憤；但別高估他們。例如新鴻基地產，在 1997 年最高峰時，股價是\$116，今天也大約是\$110 至\$120 左右浮遊。二十多年了，股價未有甚麼上升，若你說財富都去了地產商，那不是十分準確的。其他的地產公司也差不多。樓價這麼高，為甚麼地產公司這樣不濟？因為政府提供的地很少。以前香港平均一年建私人單位三萬個，但現在只要萬多個，2009 年只得七千多個。同時，香港創業的人也不多。反而是投資銀行那些人，收入便上升很多。我讀經濟，對於投資銀行的人賺那麼多錢，我也感到不大合理，我認為我的收入應該比他高。不過我不會特別眼紅，因為我預見他們很快會有問題，因為金融科技 fintech 出現，已經證明用電腦和大數據合起來作投資決定，回報率可以更高。香港強積金找那些基金經理，收費貴，回報又差。現在我們仍然可以罵他們，因為他們食水很深，不過我估計不用罵多久，因為他們快被淘汰了。當 fintech 更流行普及，憑甚麼要我把錢投放在基金經理，讓他管理？我有電腦，有程式便可以了，為甚麼要靠他們？讀 quantitative finance 那些，隨時是夕陽行業。若你讀 finance 和 computer，那又不同，是旭日行業。你要掌握世界的變化。

以香港為例，在很有錢的行業工作的人，有些賺錢多，你會認為值得，有些不值得。主要來說，有些人工作態度不同。我曾問一位世侄女，三十出頭，一個重要金融機構的高層。我問她憑甚麼坐那位置？我又問她，他們希望聘請甚麼樣的人？她說有很多很高薪的位置請不到人。究竟香港的勞工缺乏甚麼？是否技能錯配？她不認為是這樣。他們所需要的技能不是很高，並不是太難；而是工作態度。她認為最難忍受的，是見工時已說明要五點放工，而他們那一行很難保證五點放工；也有不願意出差的。做金融界時時要到處去，試過有員工的母親打電話來，要求不要派她的子女出差，因為太辛苦，又或者危險（但其實不危險，例如去上海、北京有何危險？犯罪率比香港還低）。她認為那些母親打電話來最難對付，而這是普遍現象。這種「母親打電話到公司」已經影響了行業，例如高盛已經開始實施，星期五晚不用員工工作；以前那些人要做到三更半夜，然後去蘭桂坊飲酒收風；現在規定了星期五不可以要求他們工作，因為那些母親投訴太多。但也有部分香港人很博殺，很願意掌握機遇。

社會走向兩種極端：一種是小確幸，得到小小好處，例如有人請吃一頓不錯的晚餐，便已經十分高興；在 facebook 發表一篇東西，有人給 likes 便很高興。我不明白他們為何如此喜歡 likes，一個讚好對我的情緒來說，毫無影響。有些人是小小事已經很滿足，然後沒有興趣去追求更大的事業或理想。又或者，他感到沒有機會達到更高層次的成功，所以麻痺了，小小的事情已經很開心。社會上另一種極端：講所謂的理想、目標，但不切實際，對社會也不見得有利。



這些走極端路線的人，我認為是衍生於社會給與這些人的機會不多，即使有，他們也沒有甚麼興趣去認識和掌握那些機會。

對於急劇變化的社會和世界，有部分是適應不來；能適應的人收入水平都提升了。適應不了的人收入停滯，但他們不會認為責任在自己，必然是諉過於社會或其他人，這也是人之常情。

香港和內地人收入的功能分布

我用 2001 年和 2011 年的數據比較（我還未有 2016 年的數據），原始的勞動力，即是純勞力，不關乎知識、技能，對香港的 GDP 的貢獻是：2001 年有 12%，至 2011 年下跌至 9%，即是以純粹勞動力所生產的東西的比重，是愈來愈低，而這個趨勢不會變。這些從較為仔細的人口普查數據中計算出來的。人力資本，即是知識對於其收入的貢獻，在 2001 年是 40%，至 2011 年上升至 43%，意思是人力資本或知識是上升的。在知識型的社會這是很正常的。至於資本的貢獻，2001 年及 2011 年都是大約 48%，資本的貢獻很大。資本其實包括土地，香港因為地理位置很好，所以全世界這麼多人想來香港。如何利用到這位置？無論買或租寫字樓，或住在這裡，你便佔據了香港土地的一部分。

在內地的情況類似。從 1978 年至 1990 年，扣除通脹後，平均 GDP 增長是 9.05%，而 2010 年至 2015 年的增長是 7.8%，這兩年是下降一些，我相信它會慢慢走向 7%。今年大約是 6.5%至 7%之間。這些增長是靠甚麼推動呢？在 1978 至 1990 年間，GDP 增長有 18%是靠勞動力的增長去推動的；57%是靠資本的增長，是由人不斷投資、資金積累而推動的；25%是靠 TFP 推動，即是全要素生產力，簡單來說，是生產力效率的進步，內裡已經包涵知識的進步。這三項加起來便是 100%。可見增長的大部分靠資金積累，而生產力的進步也很重要。

現在最新的情況：靠勞動力的增長只有 2%，快要變零了，甚至是負數。中國的人口快要進入「人口赤字」，意思是工作人口下降，它不會再怎樣推動增長，不過現在仍有少少增長，所以仍然有 2%的推動。主要來說，仍然是資金的積累，而生產力依然相當重要。從這些數字看到，勞動力的重要性愈來愈低。



中國 GDP 增長核算

	GDP平均實質 年增長率	勞動力對 GDP 增長的貢獻	資本對 GDP增 長的貢獻	TFP對 GDP增 長的貢獻
1978-1990	9.05%	18%	57%	25%
1990-2000	10.44%	4%	62%	34%
2000-2010	10.5%	2%	57%	42%
2010-2015	7.8%	2%	72%	26%

關於資本主義的幾個問題

這問題時常會有人問：貪婪是不是資本主義的動能？我認為：貪婪可以是資本主義的動能，但並不必然是。在市場機制不會假設，世界上的人都是利他主義者，即是利人而不利己（如雷鋒）；它假設即使人人都很自私、貪心，只要機制設計得正確，仍然能將負面的貪婪經過市場機制引導至巴列圖最優的結果，而收入分配也有其公平性。因此，經濟學家不會特別批判貪婪。但若問經濟學家是否喜歡別人貪心？我想是不喜歡的，但市場機制可以將這些貪婪轉化成為有建設性的東西。

關於追求利益。「利益」在經濟學上的含義很闊。例如「利他主義」，即是當我看到你快樂我便快樂，你愈快樂我也愈快樂。有人給你錢讓你消費，你因而快樂，而我看到這樣也很開心；這樣的話，當在分配資源時把東西給你，這是否符合我的利益？我認為是的，因為你快樂了，所以我也快樂。因此，「利益」在現代經濟學上包含了利他主義的成分。不過在大多數的社會情況下，利他主義的預測能力不很強，你不能說它不存在，但它不強；在某些領域較強，例如在家庭裡，父母對子女的利益是很關心的，子女愈開心，父母可以願意付出自己的所有。在經濟學上，包括對資本主義的分析，有很多理論討論利益；然而，即使是對子女，利他主義是否必然？可完全排除其他自私的動機？很難的。父母願意多生子女、多養育子女、多教導子女，這個動機可以是利他的，子女快樂所以他快樂；但也可以理解為：他是為了在退休後有多一些子女供養他，是為了維護自己退休後生活的。究竟兩者相對上比重有幾大？這是一個量度性的問題，但我們不可以完全排除自私和利他的因素。我個人相信，很多時候這兩種因素是並存的，不同的人的比重可能會有不同。



早幾年有一位法國人 Thomas Piketty (皮凱蒂)，他寫了很暢銷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他研究幾百年的數據，發現如果投資回報率 (r) 比該地方的經濟增長率 (g) 高，這同時也意味著投資的回報率比薪金的增長率要高。若長期如此，財富會愈來愈多走到提供資本的資本家處。這樣的話，財富分布是否會愈來愈不平均？是有可能的。不過他的理論也遇到一些問題。中國人時時說富不過三代，有錢人的家族是否會一直有錢下去？不是必然的。你看看香港現在的財主們，三代之前也是財主的不易找到。有些以往的望族現在也消失了，當然香港也有隱形富豪。對 Piketty 的發現的更大批判，我相信是他完全沒有人力資本這個概念。以 Facebook 作例子。為甚麼 Zuckerberg 那麼有錢？是因為他投入了很多資本？不是的。在十年前 Facebook 已經做得很好，Yahoo 想收購它，它出價十億美元，Yahoo 認為貴，還價八億；Zuckerberg 等人認為公司不止值八億，因此談判破裂。今天，Facebook 市值五千多億了。Yahoo 幾乎要倒閉了，已經被收購；以前它值千多億，但最近被收購只值 48 億，下跌得很厲害，因為它失去了好幾個很大的機會。這間公司的管治和眼光是有意義的。Zuckerberg 在十年前已經有錢，但並未至那麼厲害；為甚麼其財富一直升？他並不缺乏資金，在矽谷要找人投資不難，最重要的因素是你有沒有新的意念、賺錢的意念。意念是甚麼？是人力資本的一部分。是人力資本的一部分讓他有這樣的意念，賺了那麼多的錢。想出新意念不是資本，而是人力資本的一部分，但在一般計算上，該公司賺那麼多錢卻計算為資本的回報。事實上這不是資本回報，而是人力資本回報。嚴格來說，人力資本是跟隨人的，跟人分不開；若那人死了，其人力資本也就消失了。我們不會將這計算為勞動力，這是腦力勞動。所以 Piketty 混亂了，將人力資本很重要的回報當成資本回報，將資本回報計算得過高。他還有其他的問題，但今天從略了。

新的工業革命會否衝垮資本主義？

剛才也提過的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會不會衝垮資本主義？我認為是有可能的。本來新科技出現，若社會能夠慢慢調整，是可以安然渡過的。例如你可以接受了不用工作，一切由機械人做，你便無所事事，一樣可以生存的；又或者作投資時，我用電腦按幾個掣便弄好了。或許以後不用請地產經紀了，我靠電腦上網，看大數據，又有人為我分析哪些樓宇適合我。又或者看病，醫生現在已經有危險了：有些靠電腦斷症便可以了。手術呢？或許我們還未敢讓電腦做，估計三幾十年後可以吧。貨車司機可能也有問題，用無人駕駛的貨車便可。的士司機？自動駕駛加上 Uber 便可。想像下去，很多行業會出現問題。又例如律師，用一個很厲害的電腦，熟讀世界上所有法律典籍，以及到法庭打幾場官司，輸了機器懂得學習，它們有自學的能力，錯後能糾正。早陣子 AlphaGo 正是這樣取勝，吸收過去的錯誤，不斷糾正。唯一讓人安慰的，是人類思考用的腦力，例如用在下圍棋，所用的能量是 40w 左右；若用電腦，則需要 100,000w。有人



認為人腦是宇宙當中最複雜的東西，又很高效率。不過我想這也只是自我安慰罷了，節省一些電力又如何？若人家不在乎電力，用核能便必勝了。

台灣人李開復，他在美國讀書，現居於內地，是人工智能的專家。他認為在十年內，一半的工種會消失，會被取代。有甚麼工種不會被取代？我相信是護士，一些關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例如文學，都不容易被代替。不過有些人認為這些也可能被取代，可以錄製很多溫柔的聲音來安慰你，或許有人會接受？先不要想像那恐怖場面。最重要不要被它控制武器，否則真像科幻小說，機械人活動時你拔它的電源也沒有用，它內裡已有能量儲藏。

資本主義不是科幻小說。當很多工種受到很大量而很急劇的衝擊，是否能應付得來？若果慢慢來，或可慢慢化解，例如變成大家每星期只做五小時工作，其餘都是玩樂，好像是很理想的生活。但世界變不是這樣，有些人是整份工作失去，沒有收入。工作是否能平均分配給世界上所有的人？這牽涉很多很複雜的因素，例如那人是否有學識做那工作，為甚麼要付錢請那個人，為甚麼要那樣分配，有些人又要保護自己的利益等等，有很多種情況。若有足夠的時間，我相信資本主義可以化解得了，但這些轉變來得不慢。試想全球化只是三數十年，已經造成發達國家很多的困惑、困擾。無論香港、歐美，並不是很多人能適應，收入一直未能提升；部分能適應的人，收入便飆升了。然而，現在面對的科技衝擊，它可能更快。我認為速度更難對付。如果是慢慢來的，大家有多一些時間去準備迎接這美麗新世界，或者會令大家很空閒，又或者十分不濟。當同時間大批人失業，會不會暴動？社會的穩定如何？我認為和諧社會是不容易維持的。這個也是對香港的挑戰。所以我跟張建宗說，他是負責扶貧委員會的，要好好思考這問題。我已是過去的人，賺夠錢上了岸，可以去遊山玩水；但要為年青人想想，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最理想的資本主義

最理想的資本主義，我認為是如 Bill Gates 捐錢的那種。他的資源分配是最有效的，賺盡的；資本家賺盡不是問題，他是應該賺盡的。要知道賺盡不等如剝削，剝削不是賺盡；使用壟斷能力去欺壓別人，那不是我們心目中的賺盡；心目中的賺盡是根據自由市場、競爭市場，每人都為自己賺盡，那不是問題，那樣才能讓資源分配得最有效率。然而，人的能力高低不同，運氣也有人好有人差，造成收入分布不太理想的話，便叫人捐錢。捐錢的第一個優先是甚麼？是捐給教育。教人捉魚好過給他魚。令到人能夠自力更新，比派錢更好。經濟學家一般都會支持這樣的觀點。



芝加哥大學的芝加哥學派有幾個核心思想，除了自由市場之外，就是非常重視教育。研究教育和研究實證都是他們的特徵。自由市場需要甚麼樣的補充，令到社會的均衡不太受破壞？我相信教育是很重要的。而教育的那一部分最重要？是兒童教育。這方面他們是有證據支持的。投資一元到四至八歲的兒童的教育，他們一生人對社會貢獻的折現值是八至九元，即是一本八、九利。他們的犯罪率會較低，這些人將來對社會的貢獻大得多。

結論

我認為資本主義仍然充滿生命力，不過有很多人適應不了變化，變化速度是一個頗為麻煩的問題。將來是否能承受全球化的衝擊和科技的衝擊？我不知道。



主持：

很多謝雷教授提供了這麼多對資本主義根本性的了解。現在是自由發問的時間。

答問

問：教授你好。回到講座開始，你提到資本主義的要素：自由市場、私有權、法治。我認為有一點你沒有提及，是資本的「本」是甚麼？我認為資本的「本」是資金，這比市場重要。市場是一個環境，但在內裡發揮重要因素的是資金。以我的理解，資本主義就是用錢來衡量一切。

答：是不是以錢來衡量一切？在資本主義裡，它是比較習慣這樣做。我剛才提出兩個因素：市場和私有產權，這是所有資本主義裡應有的，我認為是最重要，在此也不排除資本主義社會有其他因素存在。但哪一個比較重要？我不完全明白你所說的「本」。若是你所說的錢，「錢」有很多種理解，可以是貨幣。貨幣只是工具，也不是只存在於資本主義市場的一種東西。中國是發明紙幣的一個國家，在宋代已出現等如現代概念的貨幣，但我不會看宋代為資本主義。當然，你提的可能是資本的累積。資本的累積是甚麼？它必須有儲蓄。生產的東西，未必完全被消耗掉，累積起來，它慢慢變成一種資本，再慢慢化成生產力。但這因素，也不見得是資本主義才有，在其他社會我相信也有。具體例子是以前的蘇聯，我相信也有，而整個國家也會積累資本。我相信我不能完全回答你的問題，不過這些問題也很難有甚麼答案。

續問：我有很多深入的思考。我認為甚麼是「本」是蠻有意思的。中國漢字很有特點。每個人說的「本質」不一樣。我們看資本主義的時候，不同人對「本」的理解不太一樣：有些人認為錢很重要，有人認為是市場很重要，有人認為是私有制很重要，也有人認為法治很重要。看到每人的觀點不一樣，出發點也不一樣，到底哪個最重要？我的觀點是：要理解到資本主義的本質，首先從錢的角度理解，是比較直接的。然後再從市場、私有制、法制去理解。這樣的一個順序，總會有個先後……

答：即使是馬克斯，他的《資本論》弄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這個名詞，他認為資本主義裡的一個核心就是資本。但在現在社會，經濟學家大概不是這樣看。我剛才提出「人力資本」這概念。現代世界的很多生產方面，已經不是傳統觀念的資本所決定的。當然，我們可以說人力資本也是資本的一種，但它跟錢有些差別……

續問：關於這個問題，當代法國的思想家 Pierre Bourdieu 在這方面有些研究。顏色的資本就是錢，接下來我們的資本再慢慢泛化……

答：我完全尊重這些看法，因為這類問題不會有一個大家同意的答案。例如我看到你，如何把你描述出來、形容你是甚麼人，我都是抽出最重要的特徵。不



同人說出的特徵不太一樣，所以不同人有不同說法，我不會反對，這會豐富我們對資本主義的一些觀點。

主持：本質的問題的確是不簡單的問題。我自己在商場上數十年，對我來說甚麼最重要？我不是經濟學家，我認為是人的質素最重要。甚麼人就會做甚麼事，作甚麼選擇，學些甚麼。通過幾十年的工作、努力和學習，沒有資本也會變為有資本。香港最有錢的人，有些還沒有小學畢業。

問：雷教授好。甚麼是尋租活動？可否解釋多一點？

答：尋租活動是經濟學上一個專有名詞。它包含很多，最大的特徵是：與權力脫不了關係。有些人控制著某些資源；本來那些資源有一定的規則，會按照規則去分配資源。我剛才舉的例子：政府有人控制著將房屋分配給哪些人，那是權力。通常有法律要求那個人按照規則去分配，但很多時那掌握權力的人會有偏袒某些人；他不會無端地偏袒，若有利益，他會容易偏袒。

「尋租」在哪裡體現？這類型職位，或這類權力，不會無端取得；必須通過自己的投資才會取得這樣的權力。舉例：大陸以前有一種說法，「讀懂數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尋租跟這說法正好相反，不是因為讀懂數理化而可取得這種權力，而是懂得逢迎上司。逢迎上司也不是人人做得到，你要摸通他的喜好，這是要花時間去明白；又或者他曾經花時間去買通某人，某人向上師為他說好話。在香港社會，現在做立法會議員，那些政客很多時不斷在進行尋租活動。你以為當立法會議員容易嗎？有時候要靠他們的學識、能力，有時候不是的；是他們做 show 做得多，然後掌握權力。掌握權力後，起碼可以賺到一筆錢（薪金），那是不錯的，而那筆錢沒有真正反映他們的生產力。在英文還有另一種講法，是 Directly Unproductive Profit-Seeking (DUP) Activities，即是他所作的對社會沒有貢獻，即是對生產等是沒有作用的。但對他的個人來說，他很有生產力，他自己賺很多錢。我們發揮想像力，會看到社會上有很多這種人，這樣的例子可以講幾百種。這是經濟學上一個很廣濶的話題，甚至在報刊上，很多人寫文章都會提及這個名詞。

主持：雷教授，那麼尋租是否包括了賄賂、做 show？

答：賄賂是其中一種。你能否說立法會的議員能做議員，是否因為賄賂？不能單純說是賄賂，他們可以告你誹謗，他們不一定曾經受賄；但他們掌握了很多東西，而且是對自己有利。

賄賂的定義，我認為首先是違法的，違法而為自己取得利益；而他取得權力後，本應按照某些規則去做，但他沒有按著去做而取得利益。

主持：最近許仕仁的案件，是很典型的尋租？

答：他是又貪污又尋租。我並不完全了解他的案件，但他已取得利益，而且是違法的。我自己的博士論文是寫貪污的，所以我對貪污熟悉。貪污應該是尋租



的一種。

會長：我認為雷教授今天的演講非常好，我幾乎上了一課現代經濟學的課。這個講題是我提供給雷教授的（雷：這題目很辣），其實我內心有兩點，其中一點跟雷教授想法也很接近。

第一、近三百年來資本主義的動力很厲害，否則不可能席卷全球，所有人都牽涉在內。資本主義這種賺錢的活動，或我們的付出想得到回報的活動，即是我們的勞力、資本、資金都要得到回報。內裡有一個很大的衝動，這可能屬於心理學，也有可能是人性論，也可能是一個歷史文化哲學的課題。這是人，人就是如此，要追求這些。一旦觸動了他的欲望，就好像打開一個大閘，洶湧而至，三百年來至最近全球化，全世界湧入。這些當然衍生很多問題，你要有很多生產條件，能源、原料、森林、土地……很多地球的出產消耗得很快。在這種高速的經濟輪子飛轉下，可能會引起很大的隱憂。你要巨大的生產力，以倍數地加速上升，現在可見速度快得不得了。

另一點是，為甚麼資本主義好像有危機，好像走到盡頭？雷教授說得很清楚。資本主義由 Adam Smith 講分工開始，分工令市場大了，令很多人捲入，不再是獨自一人生產，而是千千萬萬都捲入生產的過程。這很好，因為大家都參與了、活動了。但現在的科技發展，互聯網是講連結的，大家貫穿起來。大數據、人工智能、無限的資訊，乃至技術都串起來，很多人不需要卷入，這真正是大危機。

我們人人都信科技，到最後，我認為在哲學上講，人自身的自由（失去了）。人最重要的，不是享受的自由，而是一種創作的自由；我們是主體，是 subjectivity，這樣下去我們會喪失，在玩樂、享受之外，我們已經沒有事可作。我們已完全信任科技，任何事都先問問科技：這事如何做？待它回答。最近下棋高手敗於 AlphaGo，所有一流的大棋手都輸了，令到柯潔也哭了，他說電腦太完美了，跟電腦下棋一點快樂也沒有。在此，人的情沒有了，因為電腦是冷冰冰的。所以我認為這是很大危機。資本主義到最後對人類會造成很大的傷害。剛才雷教授說到技術的問題，我想到的是這一點。多謝。

雷：關於電腦、下棋等等，我認為不是純粹資本主義的問題，而是科技。科技厲害到這個程度，的確對人類帶來很新的挑戰。剛才你說的我都非常同意。有些問題出現了，我們是否要好好化解？市場是否有足夠能力去化解？市場可以化解很多，但能否化解很急劇、很大的變化？如果大的變化慢慢到來，還可以逐步化解。市場牽涉到人，它雖然是一個制度，但參與者都是人；人的反應是否可以那麼快調整？

剛才我沒有提及的，是關於環境的保護或破壞。這一點我稍為樂觀。在內地，以前開煤礦，那些煤礦老闆是亂來的，亂挖地；又例如挖稀土，也是十分破壞環境的。若問他們是否做得對？他們可以說自己只是追求利潤，但他們追求的



純粹是個人的利潤。內地的市場機制不十分完善，沒有將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掛鉤。然而，當社會慢慢進步，尤其是中產階級開始出現，那時候那些人的訴求自然會很不同。如果我們在世界各地做一些調查研究，若你問落後地方或窮人：搞工業化還是環保好些？大多數會認為工業化好，他們最重要是先能賺錢過生活；環境稍為破壞一下，他們不十分在意。但當人收入高了，訴求很不同，會認為破壞環境十分不對。在中國的發展，中產的聲音不強，令到法律的條文不一定能更改以適應發展。我相信，將來大陸，甚至非洲等的國家進步，它們都會回應環保等社會要求。若你不斷製造污染，不斷破壞環境，新的法例會出現，那是資本主義社會裡的一種補充。

主持：經濟和科技本來是兩件事。現在科技發展得太快，令人害怕起來。現在香港人要害怕的地方可多了：落後地區的人進步了，科技人又超前。我發現香港年青人有準備工夫，跟日本一樣，公司從職員身上學到：一個工作由三個人做，他們「慢三十拍」，愈來愈慢，他們的解決方法是這樣。所以現在當老闆真的很難，你想害某人叫他做老闆便可以；完全請不了人，現在經濟真的那麼好？不是的，而是新一代很懂得應付我們的問題。

雷：這種情況能夠存在，都是因為科技，或社會的生產力進步了；有這樣的財富才能負擔這種情況。過去沒有這樣的生產力的人，兩下子便被辭去了。

主持：他們有父母。

雷：是的，父母照顧著。我看過一些統計數據，經典宅男宅女，在香港起碼有好幾萬人。宅男宅女我們特別是指青年；我也是宅男，慢慢不用工作，常常在家，不過也會按捺不住上街。有些人真的可以留在家，給他們選擇：只准留在家，一個月二千元收入，還是給他一份工作，一個月萬多元，不過會受老闆的氣。很多人會寧願選擇二千元，不想賺萬多元。現在是有很多這樣的人。

主持：現在日本有個新階層稱為「低欲望」，低欲望社會。

雷：即是剛才我提到的小確幸。只要他認為是確切的幸福，便滿足了。

但另一種極端，是那種太有理想的人，然而那理想卻是虛假的，是極端的、有破壞性。那一樣很有問題。小確幸雖是不濟，若社會上人人都小確幸，這個社會便沒有前途；但若人人走另一個極端，那麼即時死火。兩個極端都是大問題。

主持：將來靠經濟學家想辦法來解決……

雷：別讓我們太沉重。

問：雷教授。大家常說「政經」，政治先行，經濟隨後。香港現在的政治環境如此，你認為它如何影響香港未來兩、三年的經濟？

答：這是很值得擔心的。如果你看香港的經濟增長率 GDP，扣除通脹後，由



1997 至 2016 年，平均每年增加 3.22%；若計算人均收入，大約每年增加 2.54%。這兩個數字在發達經濟體中，表面上不錯。前幾天中央電視也有提到這些數字，我一聽到報導便知道正確，因為我也核對過那些統計數據。但在香港的歷史環境，這算是低增長，因為香港習慣了高增長；另一點，香港貼著全球經濟增長動力最快的地方珠三角，本來香港應該增長得更快。意思是，香港現在有那中庸庸的增長，其中很大部分原因已經是靠她那得天獨厚的環境，而不是自己特別有能力。在這個位置，本應該是高增長，但實際上不高。

另一個更嚴重的問題，是在過去幾十年來收入分布、貧富差距是比較大的。在過去二十年，這情況沒有惡化，最近統計處公布數字，收入分布沒有惡化，也不是好，只是比較過去極輕微好一點，幾乎量度不了。若回看二、三十年前，社會貧富差距也是很大，那時候的人也比現在窮，為甚麼沒有那麼多怨氣？因為經濟增長快，有 6%至 8%，自然可以製造社會流動性，這令人開心一些：即使我今天窮，也看到很多人比我富有，但我相信只要我努力，我有相當的機會令我變成如那些有錢人一樣富有。因此，那時候的人不需要有那麼大的怨氣。但在今天，經濟增長率放慢，社會流動性必然放慢，有些人依然可以向上流動，我不會說香港全無機會，但不是人人都可以得到這樣的機會。只有特別聰明，或特別幸運的人才能掌握那些機會，向上流動。既然如此，部分人便會很不滿，看到別人很富有，自己環境不好，而且預見一生人也不會買得起房屋。社會難以和諧。

解決香港樓價的問題是非常必要的，否則我們見到樓價的增幅比年輕人薪金的增幅大；這有數據為證。從 1997 年至現在，根據中原地產指數，樓價上升 60%，而年輕人的收入至 2015 年是上升了 33%，至現在最多 40%。年輕人是二十至廿四歲。而用了九七年作為基數，九七年的樓價本身已經很高。所以很多人憤怒。出路在哪裡？香港在大陸的側邊，有很多機會從大陸來。若要這一批有排外情緒的人來掌握大陸的發展機會，很多是不願意的。若不願意，收入長期卡在那裡，上升不了。另一方面，社會有一批精英。舉一個例子：董建華有一個團結香港基金，他的基金製作了幾份報告，其中一些我也有參與。基金找來一批專家研究，那些報告提到香港的發展方案，有好些應該是可行的，有見地的。我也曾跟董建華說，這些方案是好，但會製造更大的貧富懸殊；當然不會因為貧富懸殊而不發展香港。為甚麼會有更大的貧富懸殊？有能力的人跟著方案去做，不論投資還是選擇工作，他會上升得快；有些人拒絕去做，他的收入便會卡著。有些人上升得快，有些人卡著，二十年後貧富差距便會大。

以我剛才所說，爭拗應該愈來愈大，很難化解，但我也不是太悲觀。現在香港人很憤怒，跟樓價很有關係，而樓價問題不是完全解決不了，只是香港把自己弄死。香港有 1110 平方公里，建私人樓宇總面積是 26 平方公里，只是很小；公屋、居屋是 16 平方公里；新界的丁屋等佔 33 至 34 平方公里。全部加起來佔香港的總面積 7%。有 78%的土地是完全未開發，不是商業大樓、工廠，全部都



不是，是未開發的。我素來認為只要挖出一小部分郊野公園的地來建屋，已足以大幅壓低香港樓價。試想，樓價不是永遠上升，董建華當年說八萬五個單位，其中私人單位三萬多是私人單位，即是私人單位每年增加1%左右。三萬幾不是很多，不用很多地，當年已經足以推倒樓價。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香港每年供應的私人單位大約三萬個，而今天講來講去只得一萬多個單位；若不是收縮這麼多，樓價不會如此乾升。能解決樓價問題，已經可以化解相當部分的怨氣。不過有些人死不肯放地。我也很喜歡郊野公園，我也會去；香港平均一年，有1200萬至1300萬人次去郊野公園，即平均每人去不了兩次，每次去數個小時？意思是，每個香港人平均每年去郊野公園頂多十個小時，或十多個小時。為了那十個小時，便讓樓價這樣厲害？我認為是不值得的。況且不是用全部郊野公園，只是要百分之一至二便可，不是叫大家不再去郊野公園，是可以繼續去的。有些人的腦真的閉塞了。究竟是腦真的閉塞了，還是根本不想香港好？

問：尋租？

答：你可以這樣說，但應該聰明一點去尋租。地產商會否認同這種不放地？我相信這對地產商是不利的，當它沒有地便不能建新樓。所以剛才也提到，地產股上升不多；不是說它食水不深，每個單位都賣得很貴，但根本沒有那麼多單位去賣。就如一個賣麵包的，雖然賣得很貴，但若他沒有麵粉，他也賺不了多少。若提供地建樓，又會有人眼紅，說地產商可以賺錢，所以禁止供地建樓。這樣的話是大家一起死亡。

我認為香港人應該退後一步，不需要每一件事都對抗。地產商是否得益，我才沒有空去理會；我最重要是看到香港的普通人是否能解決一般民生的問題。如果解決不了樓價問題，我認為香港的爭拗不會解開。靠填海？是可以的，但填海要十一年才有地；不知道為何政府那麼慢。十一年有地後，還有各種規章制度，又再四年，即是等十五年後才能建樓，到時可能已經太遲。

在市區用地，可以分出一部分？我曾經問過幾個人如張炳良、曾蔭權：為甚麼撥地那麼困難？他們訴說了一大堆政治問題。城規會以前有權批政府的發展用地；自從2000年用地有透明度，城規會問過一下區議會，而區議會是沒有這個權力的。假設你是區議會的人，有人問你是否同意撥這塊地來發展？你會怎樣回應？會不會很合作、很配合，讓城規會發展？不會的，他們是尋租者。他們佔用到位置，必然要求你派禮物：不一定是他個人得益，而是要求你做到很多要求，然後才同意你取地發展。要求你派禮物對他有何得益？他要取得選票，嚴格來說這是一個尋租活動，我不會說是貪污。很多計劃都是這樣卡住了。現在可否不問區議會？我估計法律上是可以，但政治上不可行，區議員會跟你拚命，因為他已經投資了很多錢來掌握職位，若你突然不理睬這個職位，他不會同意的。

另一個例子：香港前一陣子說要搞Uber，接著很多的士司機反對；當然反對，



因為他的的士牌，那是尋租活動的一種。的士牌數百萬一個，我以前計算過，全港的士牌值千多億元。現引入Uber，那千多億便化為烏有：為甚麼要付幾百萬元買一個牌，的士司機才可以去賺錢？如有加入競爭，那數百萬元的牌便化為烏有；他以前付出的數百萬，也是尋租的一部分，因為是付出一筆金錢，以取得一定的權力：開的士。所以的士司機一定反對。紐約也是如此，那裡的的士司機反對得很厲害，加州那邊還可以做得來。社會上、政治上，很多時會將經濟卡死。這樣說下去，會愈說愈多、愈麻煩、愈憤怒的。
不少經濟學家看一切的問題，都會認為是經濟問題。

問：香港會不會如日本，有一次樓價大跌？

答：很多人認為香港的樓價會大跌，現在的確是超出香港人的購買能力。但我對這一點比較悲觀。香港樓價乾升，原因是沒有供應；若有足夠的供應，它會大跌。我不會說它永不大跌，只要充足的供應出來，便會大跌，就如董建華時代，那不出奇；現在的供應卻那麼少，很不容易。當然，如果有一個金融危機，它會深度調整。但我們要記得：全球所有的國際金融中心，或高科技中心，樓價一定高得厲害，所有的錢都會湧到那裡。香港起碼是一個金融中心，若有運將來變成一個科技中心；就如在北京五環之內，本地人一定是負擔不了，太貴了。但金錢會湧入，買香港樓的將來不止是香港人，所以不那麼容易跌。我並不是建議你現在買樓，不要搞錯。

一切在發展經濟學研究所網頁上載的署名論文、評論、影片都屬於作者或講者，

其內容與觀點並不代表發展經濟學研究所或澳門科技大學。

All papers, commentaries, and video-recordings posted at the webpage of The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belong to the authors or speakers. The contents and views expressed there do not represent those of the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and the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